

抗战时期 云南妇女的卓越贡献

白婧



滇缅公路工地上的妇女儿童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思想，也是衡量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进步的理论尺度，至今仍然放射着思想光辉。从古到今，都有一些中国妇女同男子一样，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屈不挠，舍生忘死。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创了我国妇女运动的一个崭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也非常关心和重视妇女解放。1922年1月18日，李大钊发表《现代女权运动》一文写道：“二十世纪是压迫阶级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始终重视和勠力推进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第一期刊登王剑虹《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一文，主张妇女运动中心应移到无产阶级方向。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邓颖超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大在广州召开，在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局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爱国妇女也不再局限于躲在男子背后，眼睁睁看着日本侵略者杀我国民，夺我国土，而是整装待发，参加抗战，投身革命，奔赴前线，救亡救国，以奋不顾身的热情和无惧无畏的勇气，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战争中云南妇女革命意识的觉醒

云南妇女革命意识的觉醒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运动息息相关。辛亥革命爆发，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开始逐渐被社会认可和接受，颁发废除裹足等法令使妇女的身心得得到解放。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中，明确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倡在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革新。这就促使广大云南妇女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不断追求思想解放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爆发，云南大批青年女子四处演讲游行，筹钱筹物，推动了妇女运动日渐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杂志刊登了《非常时期妇女应有之准备》《妇女运动与民族复兴》等宣传妇女解放的特辑，唤醒妇女的民族精神和解放意识，号召广大爱国妇女积极走出家门，救治伤员，保家卫国。

抗日战争中，有100多万外来人口涌入云南，尤其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的学生中，云南本地学生只有5%，其余95%来自全国其他省市。大范围的人员内迁也带来了很多进步的理念和新的习俗，对广大云南妇女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和文化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云南省妇女会开设了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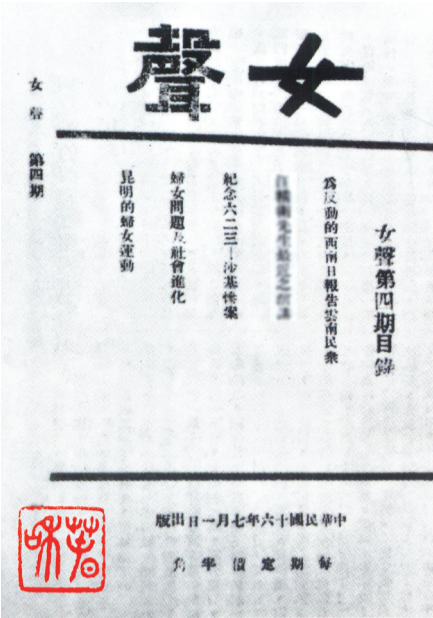
时民众学校“妇女班”，引导学员们学习《大众哲学》等重要哲学和抗战书籍，了解抗战局势，增强必胜信念。通过开展这些妇女教育活动和妇女工作，深刻影响了云南妇女的思想意识，推动了新一轮的妇女解放，广大妇女越来越重视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识字读书明理的人越来越多，云南妇女体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并且逐渐自觉地把自身解放与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紧密连接在一起。

抗日战争中云南妇女革命运动的贡献

长期以来，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妇女社会地位一直十分低下。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满腔热血，充满报国志的云南妇女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战并且作出了卓越贡献。

成立云南战地服务团。1937年10月5日，滇军60军在昆明誓师北上抗日，昆明女学生在抗战后援会的支持和领导下发动请愿游行，4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省政府，要求上战场。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称赞这些女学生是新时代的花木兰，并支持她们组建云南战地服务团积极配合全面抗战。这些女学生经过报名筛选和统一体检，组成了60人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即自愿，自费到昆明西山华亭寺进行集训后随军抗日。1937年12月13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昆明市上万民众敲锣打鼓放鞭炮为她们送行，口号声响彻云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到达武汉时还受到60军军长卢汉的接见，他安排这些女青年进行军事知识、歌唱指挥、伤员救助等训练科目，帮助她们尽快适应战地服务需要。这批队员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和教师，热情洋溢，不怕牺牲，以区分队长宋云飞为领导的十几个队员穿越火线来到战士们中间，为抗日战士缝补衣物，代写家书，冒着枪林弹雨往返穿梭在阵地上，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的抗战精神。

筹集物资做好支援工作。日本侵华战争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深重的悲惨遭遇，无数中国妇女受到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蹂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源源不断激发了爱国妇女对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诉求。抗战时期，云南作为全国抗战重要的战略物资供应地，男人们不是在训练就是在前线，这种情况下，广大云南妇女为了满足战时物资需求，从手工业生产到田间耕种，义无反顾承担起极其繁重的生产活动，顺利完成了战略保障各项任务。1941年，全省妇女在龙云夫人顾映秋的带领下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为前线战士准备药品，赶制棉鞋和衣物。日军占领越南和缅甸后，很多华侨回国，云南妇女组织专门成立了难侨服务站，帮助华侨解决实际困难，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保证抗战顺利进行。同时，为了保证抗战物资运送正常，打通国际大通道，云南开始修建滇缅公路。公路沿线的云南各族妇女背着孩子日夜不停轮班赶工期，每天参与修路的人数达到10万以上。因为云南各族妇女的牺牲与付出，这条路也称为“妇孺公路”。大量抗战援助物资通过这条公路运往抗战前线，为抗战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云南妇女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创办的云南第一份女性杂志《女声》



昆华女中学生在昆明海晏村演出话剧《上前线》后合影

收养难童维护社会秩序。1939年冬，六十军转战江西，陆续收复奉新、高安一带。战火所及之处一片疮痍，很多家庭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孤儿在倒壁危墙中哭爹喊娘，十分凄惨。当时的六十军长安恩涛深受触动，于是决定让云南战地服务团负责收容这些难童，成立了“六十军难童教养院”。根据规划，该院负责收容六十军防区内的孤儿共几十人，最小的5岁，最大的也只有14岁。服务团安排3名工作人员分别负责这些孩子的生活、学习和全面管理工作，为入院难童提供了非常细致的照顾，为这些孩子清洁卫生，洗澡换衣，取名认字，教唱歌曲。难童们根据教养院的作息时间表，按时学习和规律生活。年龄较大的孩子学会了很多字，小一点的孩子也学会了唱歌、讲故事。这些孩子向大人们讲述了他们目睹的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郑重其事地说：“我长大了也要去打日本人。”可见，服务团不仅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也把抗战和解放的火种播撒到孩子心中。

抗日战争中云南妇女革命斗争的影响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战火中前后历经10余省，历时5年，影响深远。战地服务团初建时60余人，最终回到原籍的只有30多人。198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在昆明的16名战地服务团成员再次相聚并拍照留念。一位抗战老将军十分感慨，在照片上题词：“为国许身学术兰，随军转战有余欢。安危早置乾坤外，孰料携随明月还。”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奋勇争先进心救国，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外国记者专门撰文记录了服务团的英勇事迹，该文曾被收录进英国自修大学课本，以鼓舞整个西欧的女性奋起抗争，共同抵抗德国法西斯。不仅如此，外国记者还拍摄了反映服务团接受军事和救护训练，以及服务团文艺演出和宣传演讲的纪录片，在英国广泛放映，产生很大影响。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民族陷入危难之际，毅然决然响应抗战号召，卸下红妆换武装，谱写了一曲轰轰烈烈的抗日赞歌，为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全面胜利作出贡献。

1939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开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大的作用”“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妇女也积极加入到这场革命斗争中，在战地服务、后方支援和救助老弱等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不少妇女直接拿起枪，奋斗牺牲在抗日疆场。这是中国妇女追求思想解放和权利诉求的实践表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各行各业，参与国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经过这场残酷战争的洗礼，广大妇女感性柔软的天性和经历战争后的刚强坚毅果敢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文化基因，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心同德，顽强拼搏。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尹壮图：刚直不阿 百年树人

柴亚星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阁学街有一处清代院落，坐西向东，现存三院正房和书房等建筑40余间，这是清代云南著名官员尹壮图的故居。故居外砖瓦斑驳，见证了一个朝代的兴衰和一代好官尹壮图的宦海浮沉。

尹壮图（1738~1808年），字万起，一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改庶吉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皇帝对尹壮图有知遇之恩，曾对他说：本朝很少任用云南人为大员，我看你品学兼优，就破格擢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以参奏天下仓库亏缺，被刑部“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关进大狱，判处斩刑。后来，乾隆以“不妨以谗为规，不值加以重罪也”免去了他的死罪，被贬为内阁待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壮图辞官回到云南，奉养母亲，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又被重新起用，后请辞回乡，曾掌教昆明五华书院等。尹壮图宦海沉浮，但他为苍生、为社稷，不顾自身得失，净言相谏。

为天地立心，直言敢谏。尹壮图为官是在乾隆朝的中后期，此时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乾隆皇帝早期励精图治，国家出现盛世气象。但是步入中年，由于乾隆私欲膨胀，自矜功伐，开始贪图享乐，国家吏治也开始废弛。为满足一己私欲，乾隆同意和珅实施“议罪银”制度，即官员犯法只需交钱便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该制度推行后，无疑加速了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堕落及他们对老百姓的压榨和剥削，黎民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尹壮图回家乡蒙自为父丁忧，三年后回京，来回经过南北大半个中国。他眼中所见事实与先前所知差距甚大，各地腐败横行，饿殍遍地，盛世似乎早已远去。为此，他上书乾隆皇帝，直陈议罪银制度的弊病，提出“在禁奢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希望朝廷“永停此例”。乾隆让尹壮图指出事实何在，尹壮图不惧君威，直言回复：“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然而，皇帝又与和珅自导自演了一番自证清白的考察闹剧，让尹壮图所言成为污蔑盛世的罪证。尹壮图为此险些丧命，最终不得不隐退，但他不曾后悔。

此次上书前，尹状图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其弟说：“不必代兄忧虑，区区头颅早悬之都市矣，唯愿心照料老母足矣。”尹壮图此次获罪，意兴阑珊，以回家养母为由退出官场。后嘉庆皇帝亲政，看中尹状图是“敢言之臣”，召他回京。尹壮图本就不愿做官，托母

亲故再次回滇。临行前，尹壮图再次上奏，建议“请清畿各省陋规，明定科条”，但是新皇帝只是借其大名，仍未同意他的奏请。即便前番种种挫折，尹壮图仍不改本心。

为生民立命，育人于滇。云南地处边疆，“僻远极也”，在世人眼中不过是蛮夷之地，文化自是不如江南文风鼎盛之地，但是出身云南的尹壮图一直身体力行、力求改观。尹壮图曾参与监修《四库全书》，成为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唯一云南籍官员，可见其学术造诣也是一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尹壮图辞官后回到家乡蒙自，受临安知府的聘请，主讲建水的郡城书院。此地现存有尹壮图亲撰的一副楹联：“朝廷立法无私，使者自正其心术；圣贤人不过，诸生莫负此冠裳。”不负苍天社稷百姓，这也正是尹壮图自身的写照。

嘉庆二年（1797年），尹壮图前往阿迷（今开远市）的灵泉书院讲学。灵泉书院屡废学术不兴，尹壮图在书院期间，重振兴学之风。嘉庆四年（1799年），尹壮图重回蒙自主讲崇文书院，曾撰对联：“性道发为文章，瞻儒服儒冠，矩矱敢忘私淑艾；经济根乎学问，溯南宋南北，辨香窃取旧薪传。”嘉庆五年（1800年），尹壮图任昆明五华书院山长。他在五华书院讲学期间，听众有四五百人，书院都很难容得下，可见授课的精彩。他主讲五华书院期间，中举的学生有40多人，为云南培养了一批人才。

嘉庆八年（1803年），尹壮图返回蒙自的观澜书院任主讲。尹壮图本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又兼之文学造诣、书法功底精深，所以教书自是得心应手。他知道书法是修身养性的技艺，所以在教学中格外重视，让书院的学子“每日必到书院课示，一瞬则作书”。那时，尹壮图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古稀老人，仍然收集学生的习作200余篇，不辞辛苦，一一批改，写明修改意见。在他的点拨下，很多弟子考中秀才。他教授不辍，即便生病依然坚持授课，开创蒙自一代文风，“千年树木，百年树人”，为蒙自的后续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

尹壮图诗词和书法造诣皆深，著有《楚珍自记年谱》《楚珍诗稿》《楚珍文稿》等。他晚年所撰《楚珍自记年谱》是记录他一生履历的重要材料，同时反映了清代乾嘉时期的官场情况。他在序言说明了编撰这部年谱，是为了让子孙从童年就开始养成良好的习惯，掌握读书的门径：“余所以作为此谱，正欲使子孙知下手从入之门，先端器识以立定脚跟，而器识之克端，全仗童蒙时养之以正厥，后一步有一步境界，一年有一年学力。循途守辙，庶可勉为乡里善人，至功名显晦，听诸时命而已。”

王禹甸：造福百姓 流芳百世

林娜娜



昭通清官亭公园

王禹甸是清代陕西三原举人，关于他的生平史料记载不多，但他自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就任恩安县（今昭通市）县令一年多的事迹，一直被当地百姓传颂到今天。

攻坚克难，心怀百姓。嘉庆十三年（1808年），王禹甸出任恩安县令。由于“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特殊地理位置，恩安县成为滇川黔三省要冲，又处于鼎盛一时的朱提银矿山腹地位置，当时已是一座工贾繁华的城市。史料记载：“在昔昭城，商业繁盛，广务发达，称银用秤。滇铜蜀盐，车马交驰。秦楚贲鲁，工贾群进。苏松梭布，填塞路经。百货云集，任人贩运。”另有史料载：“乾嘉年间，落（东）马厂、长发洞、金沙厂相继大旺，出银甚多。商于厂者，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饼（未经精炼的银饼）运回。”即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座人口数万的恩安县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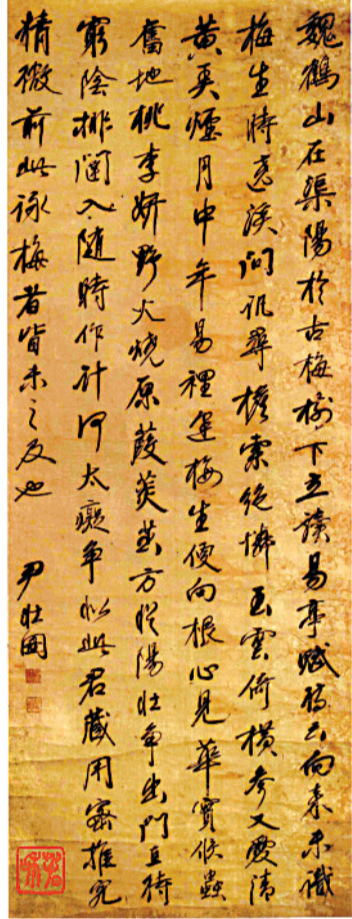
仅有两个从北郊十里之外大龙洞引水而来的小水塘供居民生活之用，遇到大旱少雨或春耕农忙之时，城内用水告急，百姓叫苦连天。王禹甸上任后，面对恩安县百姓用水困难的问题，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置之不理，而是在走访了解详细情况之后，带头捐资并倡导当地乡绅和商人集资，兴建新的储水池。储水池主体修建竣工后，王禹甸为它取名“三多塘”。“三多”出自《玉海》：“看多、做多、商量多也。”这不仅体现了王禹甸的自励自勉，也是劝喻世人。

前后相续，共促发展。王禹甸任职恩安县令一年有余，在“三多塘”主体竣工后，即卸任离去。他的继任者欧阳道瀛在“三多塘”工程全部完工后，留下了一篇记述王禹甸事迹的碑记：“城之有池不徒为御旱计也，而晨夕炊爨养生之政以寓。昭郡裴马蒙旧址，背山为城，距大河



蒙自南湖公园内的尹壮图雕像

耿嘉摄



尹壮图手迹

在清代历史上，尹壮图未如刘墉、纪晓岚等声名显赫，但他却是为数不多敢于与和珅叫板的刚直之人。如这部年谱所言，他的一生始终称得上“乡里善人”，这个“乡里”不仅仅是指家乡蒙自，也是指云南。尹壮图曾随乾隆南巡扬州，代乾隆为史可法墓上香，留下“不朽关一臂骨，梅花时助返魂香”诗句，这大概也是尹壮图一生的追求和写照吧。

（作者单位：昆明航空有限公司）

十数里，关以内无井泉，惟资涓涓之龙洞由沟入城，停蓄于大小两池。每无雨则涸且秽，军民病之。即官斯土者，金谓形势所限，无长策焉。迨嘉庆戊辰，奕山王公来聚恩邑，初下车，询民疾苦，耆士以修龙洞为请。公曰：‘水由洞出，天造地成，无所庸其导流，宜更于北城外，择地浚深池，余则潜，温则泄，既以便廊外之取携，又足济城中之挹注。’令甫下，民争赴之。阅五月而池成。既乃建庙以祀龙神，前列船房，左立仙阁，池中砌石架为歌台。费不下数千金，皆公与士庶所筹画而乐输焉。事将竣而公适解篆，嘱余续完之。”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王禹甸卸任之后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夏，“三多塘”更名为“清官亭”。当年大旱，恩安县城原有的两个小水塘无法从大龙洞引水入城，幸好有王禹甸主持修建的“三多塘”，才让恩安县百姓免去了无水可用之苦。清官亭从建成至今跨越两个世纪，承载了当地百姓对王禹甸的感恩与怀念。清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举人饶起孝，为清官亭撰写楹联：“者点水无多，一官已留清白去；此间尘不染，何人更踏红来。”这副对联是对王禹甸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流芳百世的最好注脚。

“正如旭日耀空，耀古耀今，始终浩然正派；清官似荷塘流水，流来流去，先后勤慎清廉。”任职一方，不管职位高低、任职长短，都要对当地做出贡献，像“清官亭”的建造者王禹甸、继任者欧阳道瀛一样，成为流芳百世的清官。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
云南日报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
联办



本版主编：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投稿邮箱：ynrb-llb@yndaily.com yn001@139.com
联系电话：0871-64162931 64195021 阅读理论文章请扫码进入云南理论网